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现象的组合——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宋剑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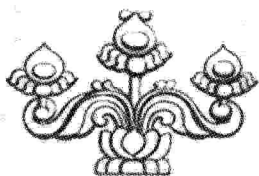
岳麓书社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现象的组合——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宋剑华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宋剑华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8

ISBN 978-7-80665-747-8

I. 现... II. 宋...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268 号

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作 者:宋剑华

责任编辑:马美著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

字数:274 千字

ISBN 978-7-80665-747-8/G·657

定价:28.00 元

承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总 序

凌 宇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间,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

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

入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订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与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

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予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序 言

宋剑华

对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个体作家现象是它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然而,历史发展纷纭万象,并非所有作家都具有文学史的“存在”价值,只有那些历史链条上的时代象征性人物,才是我们应着重关注与认真解读的客体对象。选择哪些作家作为代表性人物,这里有一个以何种标准进行遴选的认识问题。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标准去甄别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用与意义,这样的编述体例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严重束缚着研究者的理论思维,他们要么以此为是,要么以此为非,几乎形成了一种僵化教条的编写模式。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不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从纯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哪些作家可以入“史”,其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什么样的合理位置,并非仅由他的政治身份与态度加以决定,关键还是要看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建树如何,其作品究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到何种推动作用。从科学的立场上出发,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并非是作家与作品数量的简单堆积,而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意识的合理展开

过程。因此,能构成文学发展史“现象”的中国现代作家,其数量虽然很少,可他们的影响能量却非常之大;以至于对他们的所有评价,都会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百年中国文学运行规律的本质认识。他们的创作实践与社会影响,直接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变化;他们的精神理念与价值取向,集中反映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他们的思想矛盾与坎坷命运,则又形象书写着现代中国人渴望民主国家意识的历史缩影。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运行规律是什么?它的实质内涵又是什么?本书所选取的十几位作家与现代文学有着何种联系?他们又是如何体现百年中国文学“现代性”因素的?这就是我们出版这部著作,力求重新诠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种全新尝试。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毫无疑问与其精神资源和思潮运动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从问世伊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不是文学艺术家的自觉行为,而是政治思想家的社会行为。那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关键性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瞿秋白等人,他们的兴趣与志向显然不在文学审美,而是在于文化启蒙。陈独秀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其目的是想借助它通俗易懂的艺术表现形式去启迪民众,传播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文理想,故他们主张文学艺术的实用功利性;瞿秋白倡导革命文学,同样是看重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这种以“文”载“道”的思维模式,使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发生伊始,就与社会政治革命客观存在着一种紧密相连的逻辑关系。但是,过分注重文学创作的 actual 社会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必然会限制作家独立创作的自由空间,从而使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资源显得过于狭窄,最终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文学创作出现了单

一化与模式化的教条倾向。无论是“五四”、30年代,还是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一方面的某些缺陷。

其次,不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作家群体,虽然他们都热切向往西方文明,并将文学定位为“人的文学”,并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作为文学革命的鲜明旗帜与奋斗目标,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性,这批知识分子与作家群体对于西方人文精神的主观认识,普遍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主张“西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作家群体,基本上都不精通西洋文字。如《新青年》杂志的“七君子”,除胡适能够熟练地使用英文之外,其他人的英文译说能力都十分有限。由此可知,他们不可能直接去获得西方近现代社会的人文知识,而多是依据日本式的阅读体验,从东洋这一窗口间接地去了解西方文学与文化。所以,他们主张的所谓“西化”,只是帮助其完成了中国文学界的话语转换而不是思想转换。而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主力军,却在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基础上,执著地将西方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中国化。虽然语言上仍存在着巨大障碍,但却并不能阻挡中国人通过苏俄这一渠道去接近马克思主义。这一火热的政治理想,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并营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场规模宏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只是到了新时期文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才开始以科学理性精神,重新去正视历史和现实、文学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并以客观务实的认知态度,对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正确判断与选择。文学由不自觉地自觉,无疑真实地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内在运行规律。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传统、西方、日本和俄罗斯

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影响与组合,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多重文化色彩的奇特景观;而不同时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也就清晰地反映出了这一鲜明的历史印记。

“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与郭沫若两位文坛巨将,他们的文学创作无疑就是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鲁迅与郭沫若两人的创作风格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动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救亡图存的启蒙主义。鲁迅与郭沫若都曾在东洋留过学,他们通过日本这一窗口认识和了解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意识,都对改造中国封建社会体制抱有极大的政治热情。鲁迅的小说以深沉而压抑的格调,深刻地表达了传统价值观念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巨大制约;郭沫若的诗歌则以高亢而悲壮的色彩,尽情地张扬着现代中国人人性苏醒后的情绪快感。其实,我们只要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使这两位文学大师分别代表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杜甫式的“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李白式的“癫狂意识”(以张扬恣肆的情感宣泄,隐喻地传达渴望入世的政治理想)。与此同时,留学日本所获得的现代体验,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怀疑思想启蒙而又崇尚暴力革命的强烈愿望,这是他们在积极探索拯救国家与民族命运的过程中殊途同归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此,鲁迅与郭沫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追求和心灵轨迹。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一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家作品数量最多,而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红色革命作家当中,蒋光慈现象首先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因为他的小说创作虽然在艺术上略显幼稚,但却以工农革命主体的故事叙事,

奠定了后来红色经典小说的写作模式,尤其是关于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问题,在蒋光慈的小说中已经得到了根本解决。在左翼作家群体当中,萧红现象也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为她的小说作品不仅文笔优美艺术成熟,更是以女性视角深刻地描写了中国妇女苦难深重的悲剧性人格,这种女性叙事方式对后世女性小说的潜在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当中,沈从文与曹禺最值得我们注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试图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力求以纯粹艺术审美的创作态度去诠释人生、表现人性。沈从文的湘西叙事,脱离现实尘世而倾力塑造“边城”净土,精心描绘出了一幅幅纯真素静的生活场景;曹禺的《圣经》情结,虽居现代都市却极力渲染宗教救赎意识,使每一出悲剧都客观呈现出撼人心弦的道德能量。这四大作家现象以其文学创作的风格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代中国文学的空前繁荣。

20 世纪 40 年代,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在国统区文学当中,张爱玲现象与钱钟书现象无疑最值得称道。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比萧红的女性叙事更加深刻也更具有思想内涵,她不仅看到了女性悲剧的社会原因,尤其揭示了女性悲剧的性别原因,她以女性特有的观察视角,对于女性心理阴影的大胆暴露,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钱钟书的一部《围城》,以极为辛辣的讽刺笔调,对于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状态与心理素质,都作了非常精妙的生动刻画,进而再次引起了国内思想界关于自我启蒙的深度思考。在解放区文学当中,赵树理现象已经被树为了一面光辉旗帜,被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以朴实的语言、鲜活的故事、乐观的情致,艺术化地再了解放区人

民的新生活气氛、新思想格调,形象化地述说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伟大理想。特别是在《讲话》背景之下,赵树理不但成为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种经典模式并得以迅速推广,国统区文学的广大作家也纷纷学习效法,这就为后来新中国作家迅速统一思想认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俄经验取代西方经验成为了中国人现代化的思想理念,使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在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当中,梁斌与柳青这两个作家现象最具有转型期文学的象征意义。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以高老忠这一艺术形象的成长历程,运用史诗般的宏大叙事手段,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的宏大场面。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以革命现实主义的英雄传奇故事,首开新中国文学政治革命史诗创作的历史先河;其场面之壮观、情节之曲折、表现之生动,都对后来政治叙事与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具有导向性意义的深刻影响。像吴强的《红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作品,在人物成长模式、传奇故事叙事等诸多方面,都与《红旗谱》具有着非常明显的承袭关系。柳青是新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关键性人物,他上承赵树理下接浩然,以莫大的革命激情和艺术想象,预言性地展示了新中国农民在崇高政治信仰的支配之下,思想与人格的巨大变化。在柳青的笔下,中国农民已不再是一群守旧落后的乌合之众,而是有理想、有信念、有抱负的民族脊梁,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固基石。这种思想创作意识不仅得到了新中国作家的广泛认同,并在浩然那里还得以无限深化与升华,最终导致了“文革文学”政治理想主义的主观偏执性。实际上梁斌与柳青现象,对于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

创作,极具涵括性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新时期文学造就了一段全民族都崇尚文学的激情岁月。无论是作品的数量或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然而,在新时期文学短暂而又快节奏的思潮变换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等现象,只不过是中国现代作家在理性批判力的推动下,对于一度中断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必要的历史连接,作家的思维意识并没有完全突破极“左”政治的束缚与桎梏,无论是作品取材还是创作方法,都还比较单一化和程式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坛才以艺术解构历史的另类眼光,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在这又一历史转型期当中,王朔现象、莫言现象、张承志现象等,便凸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存在价值。王朔些被评论界视为是“痞子语言”的社会小说,以貌似玩世不恭的叙事格调,对于中国人曾经历过的那段政治磨难,以调侃嘲讽的辛辣笔触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艺术反思。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则以新历史主义的审美视角,重新还原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英雄的真实面貌——他们愚昧但却侠义、自私但却豪放、野性但却爱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红色经典中那种英雄史诗叙事,做了大胆的颠覆与必要的修正。张承志那些宗教情绪很浓的哲理小说,其真正价值与意义并不在于作者对于宗教的诠释与理解,而是在于作者试图于民族政治热情失落之后,重新去寻找民族精神信仰的全新尝试。从解构历史到重塑理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为之付出了自身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因而他们也获得全社会的高度赞誉。不过,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过程过于短暂,离我们越近反而会迷失我们的理性思维,这就需要我们文学史的撰写者,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去

等待必要的时间沉淀,由下一代学者去对那些复杂纷繁的文学现象加以科学定性。

从“五四”到新时期,在不到百年的文学历程中,中国作家对于文学现代性的思想认识,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链条。如果我们人为地忽略作家现象而去空洞地谈论“文学史”,既脱离客观历史语境,也无任何价值意义。所以,从作家现象的角度入手去重新诠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虽然也不免会出现一些理论上的局限性,但是,这种以作家为中心而全面展开式的研究尝试,自然也会为本学科开拓出一片全新的研究疆域。我希望我们的主观努力,能够得到学界同人的真诚理解。

目 录

总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梁启超现象 /1

第一节 梁启超现象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2

第二节 梁启超对西方思潮的选择与传播 /8

第三节 梁启超现象的深远影响 /21

第二章 胡适现象 /27

第一节 胡适入主“五四”新文坛的思想背景 /27

第二节 胡适白话文变革理论的时代意义 /32

第三节 胡适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 /39

第四节	胡适新文学创作导向与典范作用	/47
第三章	鲁迅现象	/59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历史反思	/60
第二节	鲁迅现象的历史背景	/69
第三节	鲁迅文本的重新解读	/76
第四节	鲁迅现象的深远影响	/88
第四章	郭沫若现象	/97
第一节	新文学的处境与郭沫若现象的必然	/98
第二节	郭沫若的创作实践与传统文化思想资源	/110
第三节	郭沫若现象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122
第五章	郁达夫现象	/130
第一节	郁达夫现象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30
第二节	郁达夫的创作风格与价值分析	/139
第三节	郁达夫艺术气质的后世影响	/149
第六章	蒋光慈现象	/161
第一节	文学“意识形态化”与蒋光慈小说的历史必然性	/162
第二节	反叛与建构——现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时代转变	/186
第七章	萧红现象	/196
第一节	虚妄的反抗——离家	/200
第二节	恐惧与渴望——寻家	/209
第三节	忏悔与回归——回家	/220
第八章	沈从文现象	/235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沈从文现象	/236
第二节	边民文化心理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	/241
第三节	沈从文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	/259